

独臂将军晏福生

□ 孙 彤

2、红6军团统一行动，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长征途中的两次追悼会

11月，红2、红6军团发起湘西攻势，占领永顺县城。接着，国民党军以新编第34师3个旅共1万余人，逼近永顺城。红军主动弃城北移，诱敌深入。贺龙等决定在龙家寨以北的十万坪谷地设伏歼敌。晏福生与团长吴正卿率第49团作为主力参加了战斗。晏福生在指挥第2营冲进寨头时，发现一股敌人突破红军包围往西逃窜。晏福生来不及调动部队，立即带着警卫员急追。

战斗结束后，晏福生和警卫员下落不明，大家都以为他们牺牲了。当时战况紧急，部队要马上转移，吴正卿将全团指战员集合在一起，决定举行一个简短的追悼会。就在追悼会进行之时，晏福生和警卫员扛着缴获的枪支，押着几个俘虏进入会场。大家都愣在那里，晏福生看着战友们窘迫的样子，自己先乐了：“敌人还没有消灭，革命还没有成功，阎王爷不愿意收我呢！”一场虚惊之后，大家禁不住开怀大笑。

紧接着，“死而复生”的晏福生率第49团，协同其他部队连克桑植、大庸等县城。1935年2月底，第6军团重建第18师，晏福生任政委。11月，晏福生又调任新组建的第16师政委。这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起猛攻，红2、红6军团决定实行战略转移。1936年7月，由红2、红6军团与红32军在甘孜组成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10月4日，第16师作为右纵队前卫，在师长张辉、政委晏福生带领下，为军团开辟前进通道。5日，进至天水娘娘坝镇时，张辉不幸牺牲，晏福生率部继续北进。7日，第6军团在罗家堡与胡宗南的主力遭遇，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晏福生率第16师浴血奋战，成功掩护主力转移到安全地带。就在他指挥部队边打边撤时，右臂被炸伤。警卫员赶紧把他扶到隐蔽处包扎伤口。从隐蔽处出来后，他们才发现与部队失散了。这时追兵将至，晏福生命令警卫员带着文件包和武器追赶部队，自己暂时隐蔽起来。

军团政委王震得知晏福生负伤下落不明的消息后，立即派人返回罗家堡寻找，但我漏当天同敌激战的每个山头 and 土沟，均未见到晏福生的身

影。当部队到达渭河北岸，暂时摆脱了尾追之敌，王震为晏福生举行了追悼大会。然而，10月下旬，晏福生居然再次“死而复活”，拖着断臂追上部队。

原来，警卫员走后，他挣扎着爬到山下，躲进一座破窑洞里。天黑后，他敲开一间茅屋的门。房主见晏福生负了伤，便把他扶进屋。第二天，晏福生将仅有的两块银圆留给房主，换上一身旧衣，将右臂用布带吊在胸前，左手拄棍，艰难地向北追赶部队。

4天后，晏福生来到渭水河畔的五十里铺附近。这里被国民党军控制着。急于追赶部队的他蹚过湍急的河水向对岸游去。接近北岸时，他被巡逻的敌人发现。晏福生冒着弹雨，奋力爬上岸，摆脱了敌人。

由于伤口化脓溃烂，晏福生当时发着高烧。经过半个月跋涉，他以惊人的毅力在通渭县境内追上了红四方面军第31军的一支部队。由于他当时身着便装，拖着断臂，该团官兵无法确认他是第16师政委。

正当晏福生苦于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时，在该团团部，他遇见了老上级萧克。两人此时相见，感慨万千。萧克立即派人将晏福生送往红四方面军总部医院进行救治。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部长苏井观和医生刘朋来、陈仁山等人给他做了截肢手术。

南泥湾的生产英雄

1938年3月，八路军第359旅第717团政委刘礼年在战斗中牺牲。前方需要干部，毛泽东想到了正在抗大学习的晏福生。抗大结业后，晏福生任八路军第359旅第717团政委。随后，他率部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1939年8月，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保卫，第359旅调回延安。晏福生率部投入保卫边区的战斗。1941年初，第717团随第359旅进驻南泥湾屯田垦荒。全团机关人员纷纷上了开荒第一线，一天下来全团就多开荒地20多亩。

1942年春天，朱德、贺龙等来到南泥湾视察。广大指战员经过一年的奋战，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开展了手工业、运输业、商业等服务行业，使南泥湾面貌焕然一新。朱德称赞南泥湾是“陕北好江南”，贺龙欣然给第717团题词“铁的七团”，以资鼓励。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奖励了22名

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把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决定》所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梁八柱”。《决定》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也借鉴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有突破，思想性和指导性都很强，是继续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全会结束后不久，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极大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改革。同时，我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投资体制改革、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加快建设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经过一系列改革，我国不仅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极大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还为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中国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

生产英雄，晏福生名列其中。

浴血黑山阻击战

1947年8月，晏福生任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第28师政委。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廖耀湘指挥所辖5个军组成的西进兵团，向关内撤退。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命令第10纵队坚决阻击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于黑山、大虎山以北地区，以使攻打锦州的东野主力回师围歼廖兵团。战斗即将打响。在第28师动员会上，晏福生说：“即将到来的战斗，必然是一场极残酷的浴血战！我28师全体指战员誓与阵地共存亡，让敌人在黑山阵前尸横遍野！”

24日，廖耀湘集中7个师（旅）兵力，在200余门重炮和200余架次飞机的火力支援下，向黑山、大虎山发动全线攻击。我军伤亡惨重，101高地等相继失守，形势非常严峻。晏福生与师长贺庆积研究决定，在高地设立一线指挥所。全师指战员士气昂扬，打退敌人连续发起的3次冲锋。随着战局越来越紧张，黑山防线危如累卵。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直接来到第28师前线。晏福生对梁兴初说：“我们立军令状，一定把阵地夺回来！”梁兴初放下手中的望远镜，目光转向晏福生：“军中无戏言！我调1个营来增援你们。”

晏福生把师部非战斗人员组织起来，编成两个连，配合第30师的1个营火速增援前线。18时50分，丢失的阵地又被英勇的第28师第3次夺了回来。26日凌晨5时，第10纵队接到东总电报：“东进主力已到达，敌已向东溃退，望即协同主力动作，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至此，第28师黑山阻击战胜利完成。

战后，政委晏福生和师长贺庆积来到101高地。此时的101高地已被炮火硬生生地削去2米，山上的树木和石头都被硝烟熏染得漆黑，还有遍布的烧焦的尸体，成了名副其实的黑山。两人摘下军帽，久久地站在高地上，向牺牲的战友们致哀。

1955年，晏福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毛泽东曾感慨道：“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

（摘自2022年7月10日《解放军报》）

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践已经证明，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巨大的制度创新创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活力，为我国在强国之路上越走越宽广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今天，我们已经近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只有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活力。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廖伯英1919年到1924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其间实现了从进步青年到卓越革命者的转变。她敢为人先，参与筹建了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试图探索一种新的理想社会。她追求进步，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在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敢为人先 勇于探索

1899年10月，廖伯英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7月，廖伯英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北京女高师”）理化系。北京各种新的社会思潮让廖伯英大开眼界，为表达自己与旧的封建制度的决裂，她将一头长发剪成了齐耳短发。廖伯英到北京不久，认识了湖南籍的北大学生何孟雄，通过他参加了工读互助活动，开始了社会实践。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十分流行，但其颇为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1919年底，王光祈在北京成立了工读互助团，下设4个小组，其中第三组为女子组，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廖伯英等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社会，她为此还从女高师退学。

1920年3月，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第三组）正式开张营业了。廖伯英等拟定了《第三组工读互助团简章》，规定工作种类暂分为织袜、缝纫、刺绣、小工艺（制墨水、信笺、信封、帽子、手巾等）、贩卖商品及书籍五种。开张之日，她们还四处张贴“小广告”：“要做衣服吗？请快到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17号。手工精致，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

工读互助团提出“我即是团，团即是我”的主张，宣告“脱离家庭关系，取消婚姻关系”。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原先筹集的款项很快用完，营业收入又很少。他们开办的食堂“事少人多，入不敷出”；放映电影却是“生意冷落，不得已只得停止了”；如洗衣等生意也是经营不善，难以后继。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宣布解散，第二组随后解散。1920年8月后，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也是难以后继，逐渐走向瓦解。1920年9月，廖伯英重新考入北京女高师。

“工读互助”试验的失败，对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进步青年来说，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径，这就为他们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向往光明 追求真理

在工读互助团失败和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立后，李大钊加强了对青年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1920年7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政治学系和史地系任教，所授的“唯物史观研究”大受欢迎。李大钊也在北京女高师兼课，很受推崇。

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廖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在4月加入。他们常聚在北大“亢慕义斋”图书室，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廖伯英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时，何孟雄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是廖伯英受李大钊的嘱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据罗章龙回忆：“现在我有这样一些印象，何孟雄的爱人廖伯英比他先参加党。何开始是无政府主义者，最初他不赞成我们的做法，可我们想争取他。”“廖伯英是女师大的，我们通过她去做何孟雄的工作。”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大成立。李大钊任书记，成员有邓中夏、何孟雄、廖伯英、张太雷等。廖伯英由此成为我党最

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廖伯英

□ 何立波

早的女党员。在1921年中共一大之前仅有两位女党员，即廖伯英和刘清扬。在李大钊的领导下，1920年11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邓中夏、何孟雄等40人参加，廖伯英是唯一的女团员，也是我国第一位女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投身革命 以身许党

中共一大之后，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任北方区委书记，廖伯英任区委妇女部部长。1921年秋，中共北京西城支部和北京东城支部成立，这是北京最早建立的两个党支部。其中，西城支部主要由北京女高师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党员组成，廖伯英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1921年7月，何孟雄和廖伯英结婚，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成为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途经北京时，就住在这里。廖伯英、何孟雄一面上学，一面从事革命工作。他们的名字中有“英”字和“雄”字，同志们就戏称他们为“英雄夫妻”。

1922年2月，廖伯英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并在自己任编辑的《工人周刊》上报道工运情况。1922年下半年，廖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并兼管妇女部。她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到丰台、长辛店等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2月，廖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总罢工，和朱务善以北京学生会代表名义到武汉活动，声援京汉铁路工人。李大钊对廖伯英的工作很满意，称赞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5月，张国焘被捕，供出李大钊、廖伯英等共产党员。京师警察总监下令抓捕，廖伯英由何孟雄送出京，回到长沙。1924年6月，廖伯英任长沙女师附小主事（校长），翌年3月任中共湘区妇委书记。五卅惨案后，廖伯英在长沙发动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女子募捐队，有力声援了上海工人。廖伯英1927年10月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1929年10月因伤寒不幸病逝，年仅30岁。她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至胜利……”

廖伯英始终坚定“以身许党”的崇高信念，“向光明的路上走”。她是中国革命特别是妇女运动的先驱，谱写了一位女共产党员的青春之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摘自2022年11月3日《人民政协报》）

（上接1版）

经过系列座谈、深入思考，江泽民同志于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了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立足全球视野，不仅谈到“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认识作了系统回顾，还介绍了国内关于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些代表性看法，并强调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他在讲话中鲜明提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还指出，“觉得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群众所接受的”，并指出“虽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也与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上是赞成的”。

6月12日，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征求邓小平同志的意见。邓小平同志表示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指出，“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江泽民同志就党校讲话征求了党内意见，结果表明党内对此普遍赞同。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